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(二)

“七七事变”爆发,全民族奋起抗战!

宛平城外响彻天际的炮火,唤醒了中华民众的力量。

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相继发表抗战宣言,全国各党派、社会各界纷纷表达支持抗战之决心。国共两党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危机的加重,由原来的对立、停战走向合作,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,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

中共中央发表通电

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,中共中央发表《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》,指出:

“全中国的同胞们!平津危急!华北危急!中华民族危急!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,才是我们的出路!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。全国上下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。”“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、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,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,抵抗日寇的侵略!”

同日,毛泽东、朱德、彭德怀等致电蒋介石,“庐山蒋委员长钧鉴:日寇进攻卢沟桥,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……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,与敌周旋,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。”要求“本御侮抗战之旨,实行全国总动员,保卫平津,保卫华北,收复失地”。

1937年7月9日下午,彭德怀、林彪、刘伯承、贺龙等代表全体红军致电蒋介石:“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,并请授名为抗日先锋,与日寇决一死战!”同时,红军将领致电宋哲元,表示“誓做贵军后盾”。

北平中共地下组织发动各界同胞援助29军抗战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、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、北平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代表赴前线慰劳抗日官兵;青年学生参加情报、募捐、救护等工作,并组织战地服务团;长辛店的工人运送枕木、铁板和铁轨到宛平,修筑阵地;郊区农民为前线输送粮食、饲料、燃料和民工。人民群众的支援,激发了29军广大官兵的抗日热情。

蒋介石庐山号召抗战

卢沟桥事变的爆发,也把国民政府从有限妥协推上了抗战建国的道路。事变爆发后,蒋介石确立了“不挑战,必抗战”的态度,并立即派军队北上,增援华北。7月10日,蒋介石向全国各行营、绥署及各省市发出密电,要求全国各地各部队“确实准备,勿稍松懈,以防万一”。这件密电实际上是一秘密的全国动员令。

7月17日,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,指出卢沟

桥事变不是偶然突发的,是日本“处心积虑的谋我之极”的结果,卢沟桥事变发展的结果直接关系到“中国存亡的问题”,中国已到了“最后关头”。“最后关头一到,我们只有牺牲到底,抗战到底,唯有‘牺牲到底’的决心,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。若是彷徨不定,妄想苟安,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!”

中国政府对事变的解决有四点立场:

- (一)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;
- (二)冀察行政组织,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;
- (三)中国政府所派地方官吏……不能任人要求撤换;
- (四)第29军现在所驻地城不能受任何约束。

这四点立场是中国政府解决事变的最低立场。卢沟桥事变若不能和平解决,“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,以求国家的生存”。

蒋介石在庐山的这一谈话,是国民政府对日方针的根本性转变,标志着国民政府抗战建国方针已初步确立。

从当时社会反应看,宣言的发表,无疑是一次全国抗战的大动员,它向世界宣示了中国政府团结御侮、反抗侵略的正义立场,日本当局也由此意识到面对侵略起而反抗的“中国国民政府对日全面战争的明明白白的决心”。

8月14日,也就是淞沪抗战的第二天,国民政府正式发表《自卫抗战声明书》,向全世界庄重宣布:“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,遇有侵略,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。”之后,中国军队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复兴,在战场上和日寇展开了殊死搏斗。

各党各派坚决抗日

卢沟桥事变爆发后,各党各派也纷纷致电国民政府,要求立即对日作战。原先活跃在中国社会的一些中间党派,如第三党、国家社会党、青年党、救国会、中华职教社、乡村建设派等,迅速参加到抗日的阵营中来。

1937年7月10日,第三党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团结御侮、抗日救亡的八项主张。10月,李济深、陈铭枢等表示“拥护政府”“增强全民族团结”,自动解散中华民族革命同盟。1938年4月,国家社会党领袖张君勱、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先后致书蒋介石、汪精卫,表示“方今民族存亡,间不容发,除万众一心,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外,别无起死回生之途”。

除拥护政府对日作战,各中间党派还在创办报刊,进行抗日宣传;组织各种民众团体支援抗战;发动募捐,慰问将士,救济灾民;贡献良策,争取宪政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。更有许多中间党派成员,直接参加正面或敌后战场的对日作战,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英勇捐躯。中间党派在抗战中还有一个特殊贡献,就是调停国共。他们在抗战的两大党派之间调和纠纷,促成谅解,为全国团结抗战、一致对外起了积极有效的作用。

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

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,国共双方正式磋商合作抗日的具体事宜。谈判从1937年2月11日开始,到卢沟桥事变爆发,历时近五个月,会谈三次,在政权、军队、根据地等根本问题上未能完全达成协议。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产生了一股无与伦比的强大动力,冲开了从1935年底开始酝酿、西安事变奠立基业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功之门。

继毛泽东、朱德、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,表示愿为效力后,7月15日,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递交了《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》(即“共赴国难宣言”)。7月17日,国共第二次庐山谈判开始。8月18日,蒋介石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同意中共方案。9月22日,国民党中央社正式发表中共的《共赴国难宣言》。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,表示接纳共产党为国效力,承认中共的合法

地位。历经坎坷,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正式形成。

此后,在长达八年的时间内,国共双方的军队分别以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为主体,共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。

各界投入抗日洪流

卢沟桥的炮声成了中华民族总动员的号角。全中国人民不分党派、阶级、民族、宗教、职业、性别、年龄,纷纷自觉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。整个中华大地到处都是抗日的怒火,形成了中华民族史上空前的团结御侮、抵抗侵略的壮观局面。

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以后,山西、广西、四川、宁夏、云南、青海等省的地方实力派仍占据着地盘,并拥有数量不少的军队,中国实际上还处于半分裂的状态。卢沟桥的炮声促成了国民政府军令、政令的统一。事变发生后,各地方实力派纷纷发表通电,拥护中央,拥护抗日。1937年8月,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防会议,各省军政长官均出席会议。

知识分子在卢沟桥事变后也改变态度。蒋介石庐山讲话之前,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对记者说:“再这样下去,国将不国,还谈什么研究问题、科学救国!当今最大的问题,就是全国同心,把日寇赶出中国!”抗战爆发后,抗日急先锋青年学生们长途跋涉来到大后方,在那种“外面下大雨,里面下小雨;外面雨已息,里面犹在滴”的教室中坚持学习,保存和发展着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。当祖国召唤、形势需要的时候,他们又毫不犹豫地投笔从戎,奔赴战场。

血战沙场的士兵和源源不断的兵源补充,主要来自农民。他们一个个走上前线,兄去弟又离,子亡父不归;他们把自己胼手胝足收获的粮食一袋袋供应前线。农民以努力生产、协同作战支持着抗日根据地的发展,以节衣缩食、忍饥挨饿支撑着大后方的巩固。

世界各地华侨纷纷组织起来,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。富商巨贾,不吝金钱;小贩劳工,亦尽血汗。捐款是华侨表达自己爱国之心的一种方式,据统计,从1937年到1941年初,广大华侨捐款总数达26亿美元,平均每月约6000万,成为支撑抗战的重要财源。

(据《新民晚报》)

